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方案: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

肖 鹏

摘 要 文章以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的历次关系重构为切入点,通过“中外图书馆学关系互动的诠释框架”的构建,对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正在走向世界化时期。作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将以“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为中心,其重心将从“先进经验的“中国化””转为“中国经验的世界化”。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理论生成、理论陈述、理论传播等方面探讨了通往图书馆学“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的三道难题,并对学科—行业共同体提出建议,以推动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表1。参考文献26。

关键词 图书馆学理论 中国经验 中国方案

分类号 G250.1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to Chinese Approach: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iod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XIAO Peng

ABSTRACT

The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and that of the external library scienc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se relationship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o find out the future tendenc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elaborate the inner logic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xternal library theory, the author construct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actors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mainly shows their impact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mode of think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the autho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going to th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focus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s been the “localization of advanced experience”. With the revival and rise of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the focus of the Chinese libr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will shif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技术赋能视阈下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编号:18CTQ006)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youth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Scholarly Need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Targeted Library Services Strate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No. 18CTQ006)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肖鹏,Email: xiaop25@ mail.sysu.edu.cn,ORCID: 0000-0002-6668-812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Peng, Email: xiaop25@ mail.sysu.edu.cn, ORCID: 0000-0002-6668-8122)

experience in the next several years. In this contex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provide the world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approach. The article also presents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approach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theory generation, the theoretical state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in the new perio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idea, and bring our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practice. 1 tab. 26 refs.

KEY WORDS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Chinese experience. Chinese approach.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靠两条腿走路,左为“存古”、右为“开新”,形成了理论史与新理论互为动能、相互转化的学术传统。尤其在新旧理论更迭与代际话语转换之时,“两腿交替走”的传统更为明显:现当代图书馆学新理论的发生、新思潮的崛起,每每以旧理论的系统总结与话语重构为先兆。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型图书馆学建立之前,就有过一段经验图书馆学的恢复、总结和批判时期;而新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权利研究思潮,也是在“百年图书馆精神”的回顾与展望中集聚、酝酿而后迸发的^[1]。理论史研究是考察新理论方向的必经之路,而新理论的提出与证成也要立足于已有的地基,这两方面都属常识,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学的“存古开新”不是依靠游击、零散的力量来完成,而是由学界与业界的主体在特定时期共同回望、激烈争鸣而后贯彻主张的——图书馆学社群本身体量偏小、反借此实现高度凝聚,在诸多学科中尤见其独特之处。正因为这一传统的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曾有异化、也见逆流,“开新”的右脚可能踏错,但“存古”的左脚大致能稳住基本盘、调整再来。最终,学术大潮才得以在高峰与低谷的交错中缓缓向前而去。

自2017年迄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颁布、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或学科里程碑为契机,中国图书馆学又进入一轮以“存古”为中心的理论回顾与调整时期,并将至少延续到2020年这一国家和学科共同的重大历史节点。而“两腿交替走”的传统依然奏效——2017年,范并思教授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六十周年写就的《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一文带有先导性的问题意识,已见“开新”的火花。在对“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陈述中,该文多次提到“……放到国际图书馆学背景下考察,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并未缩小”“从国际比较结果来看……我国图书分类法与世界的距离……”^[2]等等,有意识地把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带入到国际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坐标系中去,时时以比较的眼光度量中外理论距离之短长。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已初步揭示了新一轮理论发展的动力,即: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的关系重构。

到了2019年,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的调整方向已渐趋明朗。譬如程焕文教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旨演讲中,亦以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为透镜回顾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应该突破“相对独立的闭环发展系统”^[3],发出中国声音、提炼中国思想、做出中国创新,在“开新”层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的历次关系重构作为切入点,依次探讨以下关键问题:首先,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的历次重构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造成了什么影响?未来一段时期,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历史梳理以及“中外图书馆学关系互动的诠释框架”的构建,作者发现,随着中外关系互动逻辑的变化,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开始第五次关系重构,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正在走向“世界化时期”,其研究重心或将从“先进经验的国产化”转为“中国经验的世界化”。其次,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使命既已确认,那在由此及彼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道路可能会遭遇哪些困境?尽管当前中国学界、业界已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的交流与互动之中,但让世界认同和接受来自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却是崭新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从理论生成、理论陈述和理论传播三个层面具体阐述了这些挑战。最后,文章还从学术—行业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初步探讨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

1 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的历次重构

本章拟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的历次重构,揭示它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关于图书馆学史的分期讨论甚多,但从“关系重构”的角度来剖析图书馆学学术发展的论著尚未得见。笔者斗胆试用“关系重构”作为中心概念来观察图书馆学史,不仅由于它本身就是新一轮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更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学术分期”往往固化,而“关系重构”则能凸显流动的特征。以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去理解理论发展或学术进程,更能贴近和还原现实情景。第二,把研究视角聚焦于历史分期的关

节处,将有利于我们细致考察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变化动因。

从国人零星接触西方图书馆观念至今,我们至少经历四次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的调整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互动的主要对象也在不断变化。

1.1 第一次关系重构^①:从朝贡到仿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经历了第一次重构,延续许久的朝贡关系逐渐消散,依附于朝贡关系的中国古代文献与藏书思想传播路径也为“日本路径”所替代。

19世纪末以前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主要以“东亚朝贡体系”的形式处理国际关系。“外国、外族向中国赠呈礼物称‘朝贡’;中国向外国、外族回赠礼物称‘回赐’”^[4]。“朝贡”概念源于古代中国地方向中央的“贡纳”制度,质言之,朝贡制度其实是将国内的统治方式扩散到了亚洲区域^[5]。在朝贡体系之内,古代文献与藏书思想主要由中国向东亚诸国传播。即便到1840年以后、甲午战争之前,国人通过译书与考察初步介绍西方图书馆观念时期,朝贡体系下的文献与藏书交流模式实际上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朝贡体系漫长的历史中,现当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尚不存在,尽管古代的文献与藏书思想可视为其前身,但实质仍有不同。本文将这一时期纳入考察,实与下文诠释框架的构建有直接关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方面,日本完成了独自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转变;另一方面,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西方知识……”^[6],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后更为明显,甚至数年之间,反形成了日本对中国的知识输送途径,有学者称之为“日本途径”。在这一大潮的转向之下,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关系重构,从中国对外传播文

^① 使用“重构”而非“构建”,是因为笔者考量到“古典文献与藏书思想”与“图书馆学理论”之间尽管不同,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放在同一谱系下进行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献与藏书思想转为中国向日本效仿和学习图书馆理念。此次重构开启了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的系统交流,美国图书馆模式开始由“日本途径”间接介绍到中国;其对于实践层面也有深远影响,如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兴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即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7]。

1.2 第二次关系重构:从仿习到移植

民国初期发生的第二次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重构使得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从“师日”转向“师美”“师欧”。这一次关系重构的发生,既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学习对象转变的影响,也与日本图书馆事业理论本身的缺陷有关。日本的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至晚到1871年,庆应大学的图书馆就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图书馆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基本取自于欧美^{[8]72-73};到了次年,第一个现代图书馆即在福泽谕吉的推动下建立起来^{[8]83}。图书馆事业发展较早本不是坏事,但日本对美国图书馆的学习,甚至早于美国图书馆模式初步确立和总结的关键时期(1876年前后数年),因此并没有“一蹴而就”直接引入系统化的美式办馆经验。虽然日本其后一直有学者或留学生到美国进修“取经”并作改进,但本国的传统和特色又成为另一个阻力,孙毓修^[9]、杜定友^[10]等都对此做过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文华公书林的建立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的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逐步进入了欧美化时期。笔者曾对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学)交流史有过专论^[11],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播时期,中国对日本图书馆学理论仍停留在比较粗糙的仿习阶段。在第二次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外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关系则逐渐从“仿习”发展为“移植”,由于文华图书科的存在以及中美多元交流渠道的便利,中国图书馆学更全面和深入地学习并接受了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开始在理论层面对美国的设施设备、技术方法等进行本土化移植。

1.3 第三次关系重构:从移植到徘徊

一般来讲,“关系重构”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中观概念,“关系重构”实际上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力量与学科内部力量逐步磨合与互动的过程。但有的时候,外部力量过于强大,也可能突然促成或打断关系。这里所称的“第三次关系重构”,事实上涵盖了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经历的若干次迅猛变化。

在这一期间,以中苏图书馆学理论的交流和互动维持得最为长久。1949年以前,中国已经对苏联图书馆学思想有所留意,但总体上比较零散,主要散见于期刊文章。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真正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至此,我国才开始大规模学习苏联图书馆学^[12]。1956年签订《中苏文化合作协定》之后,中国很快派出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如彭斐章教授即在当年被派出到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今莫斯科文化艺术大学)研究生部^[13]。但到1960年前后,由于种种原因中苏交恶,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播很快终止,尽管其对中国的影响持续甚久,甚至到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仍见余波,但双方之间已少有互动。

1.4 第四次关系重构:从徘徊到参考

在“文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之间经历了第四次关系重构,逐渐从徘徊不定的尴尬关系中走了出来。在这一次关系重构中,欧美图书馆学去而复归、影响依然巨大,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图书馆学理论也相继涌入,但由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问题意识已经觉醒,走向了以“建立中国图书馆学流派”为目标的本土化阶段^[14]。这就导致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已不可能再回到仿习和移植,即便“徘徊”,其原因也多在本土。外国图书馆学理论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为本土图书馆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种参考。

经过第四次关系重构,从20世纪90年代至

今,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互动频繁且稳定。中国图书馆学吸收了大量国际标准、国际技术和国际理念^[3],实现了国际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已开始较为深入地参与到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对话之中,IFLA大会在中国召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前后差不多同一时期,吴建中馆长在《图书馆杂志》主持了一系列的访谈录,与众多世界图书馆学名宿进行《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15],在某些方面已颇见得一些中国经验的拾掇。可是,总体来讲,迄今为止的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互动,还是走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

1.5 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互动的诠释框架

上述关于四次关系重构的界定与讨论必然会带来一些争议,但大致上,我们可借此勾勒出一条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交流与互动的主线。可是,这一史实爬梳的工作尚未触及最关键的问题,即当前或未来一段时期,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图书馆学术史研究多习惯于宏观事件的编排与具体史实的爬梳,对于历史发生逻辑和话语结构的探讨则比较简约^[11]。图书馆(学)史研究有一个常见的写作范式,就是以历史分期为基本方法,裁选出特定的人物、文章与历史事件,着重围绕其共同特点展开讨论,最终推演出未来理论发展的可能趋势与大致方向。这种写作范式在图书馆学之外也广泛存在,在某些场合亦有其适用性,但放在现代学术的范式框架下无疑存在缺陷。读者常有的疑虑是,为什么历史要往作者言称的某个方向行进?即便以文献计量学为基础的热点分析,对上述提问多数也只是模模糊糊地以“大势如此”“发展趋势”之

类的言语一概而过,易陷入所谓“套套逻辑”。进一步来讲,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图书馆学理论史的研究之中,它关乎一个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在历史中寻找未来?严格来讲,这个问题本不应该作为本文的一个部分,但如果不能在“存古”和“开新”之间找到合理的推论逻辑和方法论思路,那我们对理论趋势的研判恐怕是不够科学的。

历史写作的核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介绍、陈述和爬梳,更重要的是分析、提炼并构建起一个历史诠释框架,并以这个框架将我们对历史的因果假设和基本推断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预测新理论、探寻新方向^①。也惟其如此,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可以找到发力的聚焦点,而不至于无处着力、徒劳无益地来回牵扯。

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要理解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将发生的变化,则应当考察过去四次关系重构的发生逻辑。对这一问题,笔者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知识来源。其一是图书馆学界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如王子舟教授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曾就新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做过一番精彩的论述^[16],其中对“一元”“二元”等术语的使用,对本文的框架构建有一定的启发,尽管笔者对某些术语的采纳与该文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其二是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话语和解构视角。其中,苏长和教授在《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中对内外政治三种互动方式的讨论是最具参考价值的^[17]。在上述观点的启发下,作者建立了“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互动的诠释框架”(见表1),下文将围绕这个诠释框架进一步展开讨论。

① 事实上,于良芝教授近年来一系列基于历史政策文本的研究对这一范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尽管这些研究的旨趣与本文的核心议题相去甚远。具体可见《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in post-197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bri, 2006年)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学界很少将于良芝教授的成果置于图书馆(学)史的视域下,但某种程度上,她过去二十年的多项工作实可视为别开生面的图书馆(学)史研究之作,对这一领域的范式更新有着莫大的启发。

表 1 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互动的诠释框架

关系重构	历史时期	中外关系的互动逻辑
从朝贡到仿习	古典文献与藏书思想的传播时期	从内而外的一元视角
	日本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播时期	
从仿习到移植	美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播时期	从外而内的一元视角
	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播时期	
从移植到徘徊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徘徊时期	内外二元独立视角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化时期	
从徘徊到参考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化时期	从外而内的多元协调视角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世界化时期	
从参考到贡献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世界化时期	从内而外的多元协调视角

学术—行业共同体采用何种视角去看待或处理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受制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和外交路线的复合影响。这些影响的合力,在表 1 中被称为“中外关系的互动逻辑”。遵循这一思路,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的关系之所以发生重构,其直接原因便是中外关系的互动逻辑发生了变化。

对表 1 中出现的五种互动逻辑做一个粗略的划分,可分为“一元视角”“二元视角”和“多元视角”。这三者的分歧在于它们如何回答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国内外的图书馆是否遵循同样的建设与发展逻辑?显然,“一元视角”认为国内外图书馆建设与发展遵循同样的逻辑,理当无问东西;“内外二元视角”则认为,在理论上国内外(或“东方”与“西方”)的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并不适用同样的思路,有明显的“中外”二元之分;而“多元视角”则认同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有多种可能、多种逻辑。进一步阐释如下:

(1)从内而外的一元视角。指的是在朝贡体系下,国内外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文献与藏书建设思路)可以遵循同样的思路,且这种思路是由中国传播到东亚诸国的。本文之所以将“古

典文献与藏书思想传播时期”纳入考察,正因为东亚朝贡体系下,中国古代文献与藏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而第一次关系重构的本质,便是图书馆学理论的话语权发生了转移。

(2)从外而内的一元视角。这一视角也认可国内外图书馆建设应当遵循同样的理论逻辑,但是在 19 世纪末至 1949 年以前,学界基本认为,这种理论逻辑是由外国生成的。我们因此“辗转”不同国度,向日本取经、向欧美取经。在这一视角的主导下,日本图书馆观念的传播时期、美国图书馆学术传播时期等阶段的图书馆学理论话语实质上是由外部主导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元视角逐渐为二元视角所取代。

(3)内外二元独立视角。这一视角认为,国内外(或“东方”与“西方”)的图书馆建设应当遵循不同思路,而且国内、国外的理论工作没有太多互动的空间,也不需要有过多的交流,应当保持本土图书馆建设的独立性。这种视角主要见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徘徊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二元独立的对抗性视角逐渐被包容开放的多元协调视角所取代,其本质是中国对多元、复杂世界的拥抱。

(4) 从外而内的多元协调视角。这一视角认为国内外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应遵循不同的思路,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理论体系是可以对话和互动的,同时,要注重从外部吸收先进的经验与思路,推动本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外而内的多元协调视角贯穿于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作为本土化时期的主流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理论使命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为节点,应该说,上述理论使命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当然,未来仍任重道远,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仍有以“不平衡”“不充分”为代表的诸多问题尚未解决。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外关系的互动逻辑是否会发生变化?又将发生何种变化?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至2018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8]。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正在投射到与图书馆学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和信息领域,并从多个方面“夹击”,形成一种对新图书馆学理论的诉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变化,不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以及中国和平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因此“多元协调视角”不会改变。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因此,“从外而内”的理论流向需要调整。

(5) 从内而外的多元协调视角。基于上述的讨论和分析,新时期中外关系的互动逻辑应该遵循“从内而外的多元协调视角”这一新的互动逻辑。它与“从外而内的多元协调关系”的主要差异在于,“从外而内”的理论流向发生了逆转。在互动逻辑率先变动的驱动下,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正在发生第五次关系重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外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关系将从“参考”走向“贡献”。

2 世界化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及其困难

2.1 正在发生的第五次关系重构:从参考到贡献

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正在进入第五次关系重构。这一次关系重构与前四次重构在理论重心上截然不同:在过去的100多年间的四次关系重构中,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先进经验的本土化”,而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第五次关系重构中,这一重心将逐渐转变为“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我们将要通往的新时期,或可称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

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为中心。由此,衍生出两项有所不同却互相关联的理论任务,它们将是中国图书馆学界在世界化时期对全球的可能贡献。其中,图书馆学的“中国经验”强调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图书馆领域的成功实践和探索研究进行理论总结;而图书馆学的“中国方案”则是面向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与图书馆相关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情景与中国经验所做出解答——这一解答并不是绝对的、单一的、固化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可以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与具体情况,考量它们的适用性和可用性。

在先前一篇文章中,笔者尝试性地总结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这里作为案例重新阐述,有一定的改动^[19]。多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中已经积累了诸多“中国经验”,至少包括:

(1) 制度保障: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被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一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简单的“信息机构”,而是与中华民族复兴、政府职能改革、基层治理等国家、社会重大议题深度相连、密切绑定的,因而需要给予制度层面的保障;

(2) 实践探索:建设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方法

论是在实践中摸索获得的,主要包括因地制宜、有限实验、建立模式和逐步推广等环节。这一方法论在总分馆制的建设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3)文化认同:高度重视图书馆的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功能。

而将上述三点,即“制度保障”“实践探索”与“文化认同”归结起来,可以被认为是解决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的“中国方案”。基于全球化的问题意识,这一方案基本回答了“如何在图书馆事业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或地区,以一种系统化的思路迅速推进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问题,对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建设图书馆与相关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讲,上述的经验和方案应该走向世界,提供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中国智慧。

2.2 通往图书馆学“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的三道难题

上文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做出了展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缺乏走出去的传统与经验,要真正实现向世界输出图书馆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实际上有着多方面的掣肘——甚至可以说,这些困难贯穿于理论生成、陈述、传播和接受的全过程。

(1)理论生成的难题

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图书馆学是否能够产出符合世界需要的理论成果?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但与此同时,中国理论产自于异常丰富的实践土壤。中国既拥有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有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再加之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生态环境和多民族组成,我们有望积累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状况的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经验,有效应对世界图书馆事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而形成丰富的“中国方案”。类似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图书馆事业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不管是成功的经验、抑

或失败的教训,对于世界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事业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我们目前尚未能站在世界高度上去总结相应的案例和经验、实现理论化的阐述。一方面,过往的理论研究中缺少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数据科学等潮流的冲击下,图书馆实践的理论化研究难成学术研究的主流,由于当前学院派的图书馆学研究力量日益稀缺,理论生成问题恐怕会日益严峻。

(2)理论陈述的难题

在理论陈述方面,我们遭遇的主要困难是:如何用一种让世界信服的方式表达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与经验?这里面既有语言与翻译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采用国际认同的话语模式进行理论陈述。

图书馆学领域的理论话语和职业表达本身就有着宏大、空泛之嫌疑。早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Wayne A. Wiegand教授就曾批评,很多与图书馆相关的话语如“图书馆对国家的十二项好处”之类,过于空泛也缺乏严谨的证据支撑^[20-21]。过度的拔高和轻佻的表达,对学科和职业往往是有害无益的。近年来,国际图书馆界,尤其是以IFLA为代表的行业组织日益强调科学评估和数据驱动管理,某种程度上即暗藏对这种话语范式的反思。

实证理路被视为对抗空泛话语的核心手段。尽管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实证色彩日益浓重,但距离经济学、政治学,乃至于相邻的情报学、数据科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缺乏高质量、公开权威、结构完整的图书馆数据集,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生成和陈述的主要阻碍之一。

(3)理论传播的难题

相比理论生成和理论陈述,理论的传播与接受难题或许更值得关注。应该说,理论的传播与接受是比前两者更为基础的难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倘若理论研究最终无法被受众获取和接受,再完美的理论生成与理论陈述

也毫无意义。

首先要注意到,传播与接受的困境并不仅仅存在于学术领域,而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曾指出,外界对中国存在严峻的“资讯赤字”问题。她随手举出的案例恰与图书馆相关,“长期以来,在国际知识和信息库里,源自中国大陆的资讯相对匮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在英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但多是民国时期和之前的出版物。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书架上摆放的杂志,多来自日本或者台湾地区。美国的媒体几乎天天提到中国,但来自中国的声音并不多。”^[22]进一步地,从专业的学术领域来讲,中国在图情领域发表的外文文献日增,但泰半集中在信息行为、文献计量等领域,对图书馆事业中具有深刻本地特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讨论和传播相当有限,这显然是后来者还需要发力的方向。

3 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

正如开篇所述,从学术传统上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存古”“开新”不是个体化行为,而是通过学术社群与实践力量的通力合作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突破上述三重困境,应寄望于学科—行业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未来一段时期,学界和业界应当着力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本土问题意识”到“全球问题意识”的宏大转向,建立跨学科的合作机制、深化创新性的交流理念,并从共同体层面促成理论实用性的回归。

3.1 全球化的问题意识

问题先于理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方能引出有价值的理论创新,要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突破世界化理论的生成困境,首要的工作是促使理论研究的重心从“本

土问题意识”走向“全球问题意识”。

所谓“本土问题意识”指的是以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或与图书馆事业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本土问题当然不仅限于用本土手段来解决,但无论引进何种国际经验、采用何种理论话语,最终都以服务本土事业为归旨。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是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引领,参照国际关系学的相关表述^[23],所谓“全球问题意识”指的是以世界图书馆界的共同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展开理论研究。这些问题往往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与全人类息息相关,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UN 2030 Agenda)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便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议程中的教育、就业、平等和信息获取等问题就与图书馆学关联尤为密切^[24]。

要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从“本土问题意识”向“全球问题意识”转移,我们势必要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与跨国协作之中。但不是说参与了国际会议、经常出国交流,便等同于形成了“全球问题意识”,更不是说我们不再关心本土事业的发展。这一转向的真正内涵在于:它对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呼吁他们有意识地采纳世界化的眼光来观察和反思本土实践,着重关注与图书馆相关的、在当前全球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并将相关的经验和解决思路提炼为具有普遍性、可传播的知识。

3.2 跨学科的合作机制

作为小学科,图书馆学自有其“小而美”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体格往往决定声量,如果只依靠图书馆学的力量,恐怕很难跨越上文所述的陈述困境。因此,我们要积极投身于多学科的合作之中,构建跨学科的话语力量,将这种合作常态化、稳定化,形成跨学科的合作机制。

图书馆学在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之中有一个基本目标,即要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扎实证据为基础、以实证模式为方法、以典型案例为输出的

图书馆学理论陈述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其一,应当积极推动图书馆学理论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键议题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央。如教育平等、信息鸿沟等,不仅与我们息息相关,亦是许多相关领域都关心的课题,要更多地吸收和接纳来自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意见,取径多方,以求新发明与新创造。其二,应当着力模仿和引入有创造力、有说服力的理论陈述路径。那些研究范式已然高度规范化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或是着眼于世界化话语陈述的学科(如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更是我们主要的学习对象。

3.3 创新性的交流理念

解决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传播困境,需要创新性的交流与传播理念。这一举措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以批判性的思维反思过往,积极开辟新的交流与传播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国际交流的主要对象是欧美发达国家,国际学术传播与理论陈述的主要接纳者也是以欧美为主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加强面向欧美的交流可在某种程度上冲击“资讯赤字”,但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中的某些国家而言可能更为适用,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更具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

第二,实现传统交流方式与交流渠道的创新性使用。在民国时期,中外图书馆学之间就存在丰富的交流方式和多元的交流渠道,包括但不限于:会议交流、行业期刊、专家咨询、人才交换、留学访学、翻译活动、书刊互赠、展览演说、书目编制,等等。但一直以来,这些交流方式或交流渠道主要用来引入国外经验和知识,走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渠道或方式,发挥创新精神,例如设立面向海外学者和留学生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奖项,创设一本类似美国《图书馆杂志》、兼有报道和研究性质的中国图书馆学外文刊物,等等,对中国

图书馆学理论的世界化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外交载体,应当创新性地发挥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世界化过程中的作用。国家间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有时候会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碰撞或利益冲突,但各国图书馆之间的交往作为文化范畴的事宜,总体更为友好、更为和谐、更为专业。在学科—行业共同体内部,许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本身就是图书馆员,我们应当充分借助图书馆这一便利的平台,在与各国图书馆的交流活动中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扩大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力。

3.4 实用性的理论归宿

如果说上述举措基本与理论生成、理论陈述和理论传播等三方面的困境——相对,那么,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用性的强调,则是更基础、更本质的建议。倘若没有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便无从谈起;倘若缺少实用意义,“中国方案”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必须重返实用性的基点!

不管是“存古”性质的理论史研究,还是“求新”性质的新理论构建,其目的都离不开“求真”与“致用”这个坐标系。传统上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无疑更靠近“致用”一端,但随着学界、业界对现代学术话语触碰越多、了解越深,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求真”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层面来讲,这自然是好事——但是,倘若过度追求空泛的理论研究,甚至要与“图书馆”脱离关系,去图书馆化、去机构化,则有矫枉过正、失却本心的嫌疑。

笔者不知道未来作为二级学科的“图书馆学”是否会出现名称乃至其他方面的变化,是否会与图书馆“解绑”,但就个人有限的研究经验与体会来看,“和特定的机构互为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学科最独特的优势,而不是短处。和图书馆、档案馆绑定在一起,是这个学科最棒的地方!有机构就有使命。有机构立场,我们就跟国家的需求,就跟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25]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最终要立足于实用层面,但进入全球化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其对“实用性”的理解自然要超越杜威时代的单一机构视域。一方面,我们应当与世界范围内的GLAMs(即所谓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乃至更多的机构结成命运共同体^[26],将图书馆学领域的实用经验扩展开去,在服务于更广泛对象的同时,从实践中总结和收获更丰饶的理论经验。另一方面,恰如李国新教授在2019年“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学术研讨会上反复强调的,“图

书馆学属于社会学科,而社会科学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必须从“实用”与“应用”的角度来考量理论问题的解答路径和解决方向,深入参与到图书馆与社区的行动之中,惟其如此,才能提炼“中国经验”、走向“中国方案”,进而向中国乃至世界彰显图书馆学的真正价值。

致谢:程焕文教授、陈定权教授、唐琼副教授、唐艳博士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程焕文.权利的觉醒与庶民的胜利——图书馆权利思潮十年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15(1):26-38. (Cheng Huanwen. Ten year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library rights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5(1):26-38.)
- [2] 范并思.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1):4-16. (Fan Bingsi.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56-2016[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43(1):4-16.)
- [3] 程焕文,刘佳亲.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5):33-41. (Cheng Huanwen, Liu Jiaq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5):33-41.)
- [4] 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0-66. (Wu Xinbo. Japan and the “Tributary System” of East Asia[J]. International Survey, 2003(6):60-66.)
- [5]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4-45. (Takashi Hamashita. The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of modern China: the tribute-trade system and the modern Asian economic circle[M]. Zhu Yingui, Ouyang Fei,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34-45.)
- [6]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G]//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243-244. (Shen Guowe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s and the Japanese approach[G]// Wang Fansen, et al. The transitional era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dedicated to Prof. Zhang Hao's 70th birthda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07:243-244.)
- [7] 潘燕桃,程焕文.清末民初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及其影响[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4):65-75. (Pan Yantao, Cheng Huanwen.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library science into China and its imp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40(4):65-75.)
- [8] Yukihisa Suzuki.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ervice in Japan: 1860-1941[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4.
- [9] 孙毓修.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0. (Sun Yuxiu. Library[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4:30.)
- [10] 杜定友.日本图书馆参观记[G]//杜定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文集:第20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327-354. (Ding U Doo. A visit to Japanese libraries[G]//Ding U Doo,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ed works of Ding U Doo: Volume 20.

-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327-354.)
- [11] 肖鹏. 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 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3): 96-111. (Xiao Pe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terature review, knowledge base and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 44(3): 96-111.)
- [12] 程焕文. 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续)[J]. 图书馆建设, 2005(1): 15-21. (Cheng Huanwen. Vicissitudes of a century, century brilliant work: reviews and prospects of the undertaking of Chinese library of the 20th century[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5(1): 15-21.)
- [13] 韩淑举. 东风化雨 春华秋实——访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彭斐章先生[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0(3): 1-5, 13. (Han Shuju. Interview with Mr. Peng Feizhang, senior professor of Wuhan University[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 2010(3): 1-5, 13.)
- [14] 吴慰慈.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J]. 图书情报工作, 1998(1): 2. (Wu Weici.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localize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98(1): 2.)
- [15] 吴建中, 科林·史蒂尔. 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J]. 图书馆杂志, 1995(3): 32-34. (Wu Jianzhong, Steele C R. A dialogue on the future of libraries[J]. Library Journal, 1995(3): 32-34.)
- [16] 王子舟.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11(1): 4-12, 35. (Wang Zizhou. Sixty year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1(1): 4-12, 35.)
- [17] 苏长和. 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J]. 国际政治研究, 2011, 32(1): 35-45, 7-8. (Su Changhe. The process, behavior,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of the emerging Chinese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1, 32(1): 35-45, 7-8.)
- [18] 万喆. 对外开放, 不惑之年再出发[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4-17(006). (Wan Zh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start again after 40 years[N].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18-04-17(006).)
- [19] 肖鹏. 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J]. 图书馆建设, 2018(2): 23-28. (Xiao Peng. From “American Library Model” to the birth of “Chinese Library Approach”: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moment of promulgating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8(2): 23-28.)
- [20] Wiegand W A. Introduction[J]. Library Trends, 1996. 45(Summer): 1-6.
- [21] Kniffel L. 12 ways libraries are good for the country[J]. American Libraries, 1995, 26(11): 1113-1119.
- [22] 傅莹. 改进传播方式充分表达中国故事[N]. 联合时报, 2019-01-18(004). (Fu Ying. Improve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fully express Chinese stories[N]. United Times, 2019-01-18(004).)
- [23] 蔡拓, 等. 国际关系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391. (Cai Tuo, et 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1.)
- [23] IFLA. Seizing opportunities, delivering development: IFLA and the UN 2030 agenda[EB/OL]. [2019-10-30]. <https://www.ifla.org/node/67014>.
- [25] 肖鹏. 面向2050: 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科的核心知识与发展路向[EB/OL]. [2019-11-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znh7.html. (Xiao Peng. Facing 2050: core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es science[EB/OL]. [2019-11-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znh7.html.)
- [26] Byrne A. Institutional memory and memory institutions[J].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2015, 64(4): 259-269.

肖 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兼任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广州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成员。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 2019-11-12)